

但凡在俄罗斯留过学的人,估计都未被“证件”这个难题困扰过。

在中国,只要有个身份证,只要你是法律上自由人,几乎没人管你去哪里,可以说,全国各地随你溜达。对于在华的外国人,护照的功能与身份证也大体对等。然而,在俄罗斯却不是如此,护照只是其中之一的必备证件。以我所在的城市莫斯科为例。当你到达莫斯科,第一件事就是务必将一张小黄条——入

境卡收好,因为根据护照和入境卡,你所在的单位会给你开“落地签”。不要小看这个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“落地签”,它相当重要!没有它,你就无法入住酒店,尤其在安保工作相当严格的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类的大城市,只有护照、签证是无法定到酒店的。然而,麻烦的是,落地签一使用就作废。换句话说,只要你入住酒店(小城市的旅馆要求较松),那

么就需要重新办理落地签,而办理的周期至少一周以上。因此落地签过期期间,最好不要出远门,否则,被警察查到会受到罚款处罚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你需要延签,那么没有最新的落地签绝对没戏。

然而,有了这些,还远远不够。就拿我所在的莫斯科大学来说,学校的安保措施也相当严格,外人入内必须持有本校人员到

学校“出入证办理中心”办理的临时通行证才可,且入内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11点,不可留宿。那么本校人员有了出入证就万事大吉了吗?非也。学校主楼十分宏伟,主要为学生宿舍楼,有6000多个房间,一次可容纳上万人住宿。主楼分为各个区域,A区为中心区域,分布着校级行政单位,其余B、B.1、D、K等各区域为宿舍区。

城市形态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形状、街道结构、居民住宅、城市管理、城市供给……的。从大小和规模分,城市可分为小城、中城、大城、百万人口大城、千万人口大城、(欧洲以前的)诸侯城市、国际城市、大都会;从功能特点来区别,可分为县级城、城堡城市、海滨城市、工业城、大学城、山城、附属城、卫星城、体育城、城市群、桁架建筑城……城市居民数的底线在丹麦只有200人;在德国,2000人以上的住宅地才能称为城市;奥地利为5000人,瑞士、意大利、英国10000人,日本则为50000人。从城市历史来看,欧洲中世纪以后,必须拥有城市权(或开市权)才能称城市,有了城市权也就有了城市及城市居民的各种其他权利:城市管理权、市民自由权、诉讼权、海关权、围墙和捍卫权、造币权等。

城市数量在不断增加——通过新建城市或者授予城市称号(如我国出现的很多县级市)。世界范围有个时髦的概念叫“城市化”,1800年左右,德国已有75%的人住在城市里,2005年,城市人口上升到85%;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现象。

城市形态学在不断完善。早先的建城是按东西—南北走向来安排街道网络的(如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及部分美国的老城);唐朝的“京师”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设立的,改名长安,后来另建新宫城“大明宫”,唐玄宗时又加建兴庆宫,城市的布局、气势、豪华和繁荣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;日本的奈良(原平城京)和京都(原平安京)都是模仿长安兴建的。还有一种圆形的建城模式(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)。以上两种建城理念属于有规则的建城,除此以外,尚有不少不规则的建城理念,往往是为了适应建城地的特殊情况所致,如古希腊的城市以及德国中世纪有机形成的城市。

18世纪以前,中欧地区有四种典型的城市平面布置图(即街道网络图):街市型,一个城市从头到底一条长街(就像中国的古镇一条街),大一点的城市可建第二条平行的长街。鱼刺型,就像鱼的脊椎那样,主干道上伸出很多支路。辐射型,从一个中心出发向周围“射出”许多街道。古典型,如上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街道网络。

城市建设,主要还是造房子和建筑物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人民最幸福的一点是解决了住房这一沉重的历史问题,然而也有遗憾的地方,少数贪官污吏和不法的房屋开发商蓄意误导群众,不断掀起炒房子和投机买卖房子的热潮,从中大捞和大发横财,让人们忘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: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。

在错误理念的指导下,尤其是较早建造的房屋,存在不少偷工减料、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、违法施工等问题。在城市建设和造房中,千万不能忘记“百年大计”,一定要对子孙后代负责。

城市形态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形状、街道结构、居民住宅、城市管理、城市供给……的。从大小和规模分,城市可分为小城、中城、大城、百万人口大城、千万人口大城、(欧洲以前的)诸侯城市、国际城市、大都会;从功能特点来区别,可分为县级城、城堡城市、海滨城市、工业城、大学城、山城、附属城、卫星城、体育城、城市群、桁架建筑城……城市居民数的底线在丹麦只有200人;在德国,2000人以上的住宅地才能称为城市;奥地利为5000人,瑞士、意大利、英国10000人,日本则为50000人。从城市历史来看,欧洲中世纪以后,必须拥有城市权(或开市权)才能称城市,有了城市权也就有了城市及城市居民的各种其他权利:城市管理权、市民自由权、诉讼权、海关权、围墙和捍卫权、造币权等。

城市数量在不断增加——通过新建城市或者授予城市称号(如我国出现的很多县级市)。世界范围有个时髦的概念叫“城市化”,1800年左右,德国已有75%的人住在城市里,2005年,城市人口上升到85%;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现象。

城市形态学在不断完善。早先的建城是按东西—南北走向来安排街道街道网络的(如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及部分美国的老城);唐朝的“京师”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设立的,改名长安,后来另建新宫城“大明宫”,唐玄宗时又加建兴庆宫,城市的布局、气势、豪华和繁荣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;日本的奈良(原平城京)和京都(原平安京)都是模仿长安兴建的。还有一种圆形的建城模式(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)。以上两种建城理念属于有规则的建城,除此以外,尚有不少不规则的建城理念,往往是为了适应建城地的特殊情况所致,如古希腊的城市以及德国中世纪有机形成的城市。

18世纪以前,中欧地区有四种典型的城市平面布置图(即街道网络图):街市型,一个城市从头到底一条长街(就像中国的古镇一条街),大一点的城市可建第二条平行的长街。鱼刺型,就像鱼的脊椎那样,主干道上伸出很多支路。辐射型,从一个中心出发向周围“射出”许多街道。古典型,如上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街道网络。

城市建设,主要还是造房子和建筑物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人民最幸福的一点是解决了住房这一沉重的历史问题,然而也有遗憾的地方,少数贪官污吏和不法的房屋开发商蓄意误导群众,不断掀起炒房子和投机买卖房子的热潮,从中大捞和大发横财,让人们忘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: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。

在错误理念的指导下,尤其是较早建造的房屋,存在不少偷工减料、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、违法施工等问题。在城市建设和造房中,千万不能忘记“百年大计”,一定要对子孙后代负责。

进入主楼入口和分区宿舍入口都要出示宿舍“通行证”。不仅如此,各系都有独立的教学楼,进入教学楼还需要出示院系开出的“通行证”。如果你只带了进入系里的通行证,等你返回宿舍的时候就只能被困在校外了。可能是在中国自由惯了,出门连钱包都不愿带的我经常忘记通行证。常常我刚出示宿舍入口(入口在二楼,有两位保安把守)就发现忘带通行证,此时即便你立马出示房间钥匙也不行,执着的保安会打电话让专门的管理人员“护送”你去宿舍,看着你开房门,直到检查完你的通行证才离开。

然而,这还不是最麻烦的,最麻烦的莫过于延签了。即便我们是国家留学基金委和莫斯科大学互换奖学金的公派项目,出国之前就已经定好十个月的互换时间,俄方发给我们的却仍是三个月的一次性往返签证,到达莫大之后仍需立即延签。签证只能延到学期末,暑假期间,如果还需呆在学校,需要再次提交所有证件,办理延签事宜。因此,从到达莫大的第一天起,我们就忙着办理延签,每天匆匆忙忙地跑各个办公室签字盖章,但一天下来往往一件事也没办成。当我真正拿到新的签证时,原先的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。其实所有手续都很正规,然而,在俄罗斯办证就是这么困难。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办公室的工作时间都不一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所说的并非特例。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大城市,除了商场购物中心,几乎所有博物馆、剧院、行政大楼、学校、图书馆等机构都要凭证入内。即便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你也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

致,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我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师中午12点才上班,但经常要12点半甚至1点钟才到,而1点到2点为办公室茶歇时间,不接待访客,而经常4点不到她又下班走人了;负责落地签的老师每周只有一三五上班,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半短短两个半小时;宿管科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,但经常门开着,人不知跑哪儿喝茶聊天去了;校外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本是自己定的,有事需提前联系;而校长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,反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

我的朋友圈里,有一些因为人慢慢变旧了,而过生活却想方设法要出新的样子。

比如,有的希望捉住眼睛焦距就要变远的时光,一本接一本地看着书,笑说“这书与我亲着呢,它知我,我懂它,相通。读书要趁早”。

比如,有的恋上了会呼吸的紫砂壶,人养壶,壶也养着人。一支音乐一壶茶,在乐音茶韵里呼吸生活的冷暖,调养精神。

比如,有的为一串串木珠子做成的手串、项串着迷,闲下来就时不时抚摸着这些或叫紫檀或称作黄梨梨的玩意,享受着物的圆滑体贴。

他们中的一位对我说,他是把自己欢喜的东西也当成了朋友,朋友之间就是需要相互守护、养护的。“你看,我这串珠子养得多润多活啊。”听他说着,人与物的谐和,弥漫

入学校的所有公共场所。而每办一个证,你就得“享受”一番官僚味十足的机关作风、糟糕的服务意识……如此不近人情,到底是为了安全必要,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呢?

坐在长凳上等待办证的那些焦躁钟头里,我就不免羡慕生活在祖国的人们是多么幸福!我怀念在中国无需时刻持着零零碎碎种种证件的方便、快捷、高效,怀念我们到处充盈的“微笑服务”,怀念我们像习惯空气一样习惯的安全感……是的,也许不必太急于苛责我们的祖国,在很多方面,我们已然做得很好,在未来的岁月里,我们还会做得更好。

从前老城隍庙(今豫园商场)一带,书场很多,书场又往往与茶楼连在一起,像“得意楼”、“群玉楼”、“玉茗楼”、“红月楼”、“乐圃阁”等等。过去它的楼上都是茶馆,下面就是书场(譬如像“得意楼”);也有的下面是茶馆,上面就是书场(譬如像“玉茗楼”、“群玉楼”)。生意好的时候,这些书场还要分早、中、夜三场,可见当时盛况之空前。

过去的说书先生都是要跑码头的,而且大多是跑乡镇(真正的大码头没有几个人能进去)都要靠自己背,还要走夜路,因此,从前的说书先生是很辛苦的。最主要的是没有大锅饭可吃,完全凭真本事。那时候的先生也不肯完全卖力地教会你,因此得靠自己偷学。这也难怪,因为教会了你,他自己就要歇业,自己砸自己饭碗的事情谁肯做?

真本事要靠千锤百炼,也要靠不断创新,不能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。尤其是放噱和临场发挥、随机应变,这是模仿不来的,完全得靠灵性。因此,过去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优胜劣汰,成就了一批大响档。像“夏调”的创始人夏荷生(1899~1946),人称“描王”(擅说《描金凤》)。现在

的书坛上,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超越他的。张如君算是模仿得比较好的,但与夏先生相比也还是有一段差距。

时下唱“蒋调”的有秦建国,唱“徐调”的有范林元(据说已转行),唱“张调”的有黄嘉明、毛新琳;但尽管如此,也仅是唱功而已;若论说表、放噱,那都还未达到前辈艺人的水平。唱“夏调”的则更是凤毛麟角,即便有,也都没有超过凌文君的。尤其是《汉祥刺马》一折,现在书坛上有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?凌文君、凌文燕父女档,当年在“广播书场”节目中播出长篇《太仓奇案》盛极一时,后来在“文革”中还演出过现代书目《平原枪声》(当时在“西藏书场”、“西园书场”),故至今印象颇深。

可惜这些老先生都去世得较早,也没有留下多少录音和录像的资料。凌文君还有《汉祥刺马》的录音资料,夏先生却只活了47岁,仅留下《简神童》《托三桩》等少数录音,没有录像的资料,真是可惜。当然,那时代还没有录像设备,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还没有达到现今这样的高度,这是历史使然,我们是不可强求于前人的。

从前老城隍庙(今豫园商场)一带,书场很多,书场又往往与茶楼连在一起,像“得意楼”、“群玉楼”、“玉茗楼”、“红月楼”、“乐圃阁”等等。过去它的楼上都是茶馆,下面就是书场(譬如像“得意楼”);也有的下面是茶馆,上面就是书场(譬如像“玉茗楼”、“群玉楼”)。生意好的时候,这些书场还要分早、中、夜三场,可见当时盛况之空前。

过去的说书先生都是要跑码头的,而且大多是跑乡镇(真正的大码头没有几个人能进去)都要靠自己背,还要走夜路,因此,从前的说书先生是很辛苦的。最主要的是没有大锅饭可吃,完全凭真本事。那时候的先生也不肯完全卖力地教会你,因此得靠自己偷学。这也难怪,因为教会了你,他自己就要歇业,自己砸自己饭碗的事情谁肯做?

真本事要靠千锤百炼,也要靠不断创新,不能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。尤其是放噱和临场发挥、随机应变,这是模仿不来的,完全得靠灵性。因此,过去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优胜劣汰,成就了一批大响档。像“夏调”的创始人夏荷生(1899~1946),人称“描王”(擅说《描金凤》)。现在

的书坛上,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超越他的。张如君算是模仿得比较好的,但与夏先生相比也还是有一段差距。

时下唱“蒋调”的有秦建国,唱“徐调”的有范林元(据说已转行),唱“张调”的有黄嘉明、毛新琳;但尽管如此,也仅是唱功而已;若论说表、放噱,那都还未达到前辈艺人的水平。唱“夏调”的则更是凤毛麟角,即便有,也都没有超过凌文君的。尤其是《汉祥刺马》一折,现在书坛上有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?凌文君、凌文燕父女档,当年在“广播书场”节目中播出长篇《太仓奇案》盛极一时,后来在“文革”中还演出过现代书目《平原枪声》(当时在“西藏书场”、“西园书场”),故至今印象颇深。

可惜这些老先生都去世得较早,也没有留下多少录音和录像的资料。凌文君还有《汉祥刺马》的录音资料,夏先生却只活了47岁,仅留下《简神童》《托三桩》等少数录音,没有录像的资料,真是可惜。当然,那时代还没有录像设备,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还没有达到现今这样的高度,这是历史使然,我们是不可强求于前人的。

“养”也是一种正面的情绪。健康“养乐”之爱好,为着生命的乐而乐,为着世界的苦而苦,常养乐观、友善、热诚之情意,“朋友”冷了问一声,“朋友”摔了搭把手,力乏之时给养分,我们便不难拥有优质的友谊。

再朝前一步说,“养”,还是一个美好的诺言。让人人“养福”,让父辈“颐养”,让老者“养寿”,让小小少年在尽情成长中得“滋养”,让我们的伟大民族不断累积“学养”“素养”“修养”,则很多的梦想可走进现实。人与世界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友好亲近,天下太平,则善莫大焉。“环境友好型”“生态友好型”“人际友好型”社会,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今天,无论再怎么熙熙攘攘、真真假假、匆匆忙忙,我们也万万不能丢弃珍贵和珍惜、良知和善意。“朋友”间,哪能忘了相互养一养?

“养”也是一种正面的情绪。健康“养乐”之爱好,为着生命的乐而乐,为着世界的苦而苦,常养乐观、友善、热诚之情意,“朋友”冷了问一声,“朋友”摔了搭把手,力乏之时给养分,我们便不难拥有优质的友谊。

再朝前一步说,“养”,还是一个美好的诺言。让人人“养福”,让父辈“颐养”,让老者“养寿”,让小小少年在尽情成长中得“滋养”,让我们的伟大民族不断累积“学养”“素养”“修养”,则很多的梦想可走进现实。人与世界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友好亲近,天下太平,则善莫大焉。“环境友好型”“生态友好型”“人际友好型”社会,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今天,无论再怎么熙熙攘攘、真真假假、匆匆忙忙,我们也万万不能丢弃珍贵和珍惜、良知和善意。“朋友”间,哪能忘了相互养一养?

“养”也是一种正面的情绪。健康“养乐”之爱好,为着生命的乐而乐,为着世界的苦而苦,常养乐观、友善、热诚之情意,“朋友”冷了问一声,“朋友”摔了搭把手,力乏之时给养分,我们便不难拥有优质的友谊。

再朝前一步说,“养”,还是一个美好的诺言。让人人“养福”,让父辈“颐养”,让老者“养寿”,让小小少年在尽情成长中得“滋养”,让我们的伟大民族不断累积“学养”“素养”“修养”,则很多的梦想可走进现实。人与世界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友好亲近,天下太平,则善莫大焉。“环境友好型”“生态友好型”“人际友好型”社会,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今天,无论再怎么熙熙攘攘、真真假假、匆匆忙忙,我们也万万不能丢弃珍贵和珍惜、良知和善意。“朋友”间,哪能忘了相互养一养?

城市

和街道

陈钰鹏

夜光杯

灯花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知苑

新民

美食

美食

七夕会